

是非该不该商品化的广泛热议。有别于将文化作为“无生命”的商品加以出售,文旅发展不仅唤醒和赋予文化以生命,也借助文化实践营造着地方风格,“筑巢引凤”般地吸引和聚集创意人才,继而由内而外地驱动乡村焕发新生命、迭代新生命,和谐地嵌合进现代社会的发展轨道。

鉴于共同富裕是物质与精神的共同富裕,城乡融合最终将走向物质与精神的融合。文旅发展驱动了地方社会文化与经济的创新融合。当现代社会从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之时,文化创意日趋成为驱动地方发展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经济也不再是完全的理性计算和单一的线性过程,而是深刻嵌入在社会文化情境之中,是一个动态的社会互动过程和变化的文化意义系统^①。文旅发展正是从文化的经济化和经济的文化化两个方面驱动着文化与经济从二元对立关系走向相互融合、相互塑造。一方面,文旅发展为文化的经济化创造了平台空间。无论是旅游地方或旅游企业的营销,还是旅游商品的开发均要强调将文化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编织进商品和价值体系之中,以凸显差异性和独特性,而那些同质化、去地方性或无地方性的商品或空间往往会遭到市场诟病和批判。文化的经济化实践驱动在地文化的挖掘、传统文化的复兴、乡土文化的传播以及新兴文化的创意开发等,不仅实现了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转化,带动了地方经济发展,也促进了乡村文化的振兴与繁荣。另一方面,文旅发展为经济的文化化提供了外部刺激。多元主体在文旅发展过程中,通过互动协商选择、建构,赋予乡村地方以新的意义,使旅游经济活动 and 实践具有很强的“社会-空间根植性”,同时促使旅游经济活动由外而内地引导和重塑本土社会文化。

不同于物质性、单向度的文化商品化实践,文旅发展为文化和经济的互动融合、双向赋能以及地方氛围的营造创造了合宜的“温床”。由此,“文化的经济化”和“经济的文化化”等文化经济地理学思想对于理解文旅发展所产生的超越经济和文化本身的影响将更富有解释张力。未来,城乡文化与经济创新融合的表征、机制及其对创意人才吸引、社区空间营造、乡村全面振兴、城乡融合产生何种影响等话题有待学术界系统揭示。

整体而言,无论是从现实层面,还是从理论层面,文旅发展与城乡融合之间均是一种双向赋能、互促互进的关系。现实中,文旅发展全面而系统地畅通了城乡要素循环流动,以一种“软性”力量温和

地助推着城乡融合发展,同时,城乡融合也为文旅高质量发展创造着外部环境和制度条件。理论上,文旅研究有必要跳出“就文旅谈文旅”的局限,进一步延伸思考和致力于研究成果向乡村振兴研究、城乡融合研究的知识溢出效应,同时,乡村振兴研究、城乡融合研究所遇到的瓶颈亦可向文旅研究领域寻找理论灵感和可能的解决方案。

(作者系该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收稿日期:2024-04-16)

扎根城镇化与文旅融合之“道”

卢晖临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4.06.002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这既是对此前多年我国文旅融合发展经验的总结,也为新时代文旅行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最近一年来,全国各地都在大力推进文旅融合发展工作,与此同时,文化和旅游学界也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作为一个关注中国城乡发展动向的学者,笔者很为这种局面鼓舞。但研读相关讨论之后,笔者也产生了一丝隐忧。笔者注意到,这些讨论几乎都集中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方法方面,譬如如何通过场景创新、业态创新和技术创新提升消费体验^②,如何通过建设融合载体拓展文旅融合空间^③。笔者把这些怎么办的问题称作融合之“术”,它们操作性强,对于当下的文旅融合发展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如果缺少融合之“道”的支撑,难以保证文旅融合之路的正确方向。融合之道是一篇宏大的文章,要想马上达成共识并不容易。在笔者看来,对融合之道的讨论至少要包括以下内容:文旅融合的时代背景是什么?当下的中国具有什么样的社会型态?文旅融合应该充分利用哪些社会条件和特征?文旅融合的短期目标和长远目标是什么?在推进文旅融合的过程中,政府、文旅从业者、文化持有人、消费者各自扮演什么角色?以上每个问题都可能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展开讨论,在这篇短文中,笔者将着重从中国城镇化的扎根性这一社会型态特征

① 朱竑、吕祖宜、钱俊希. 文化经济地理学: 概念、理论和实践[J]. 经济地理, 2019, 39(9): 1-11.

② 吴丽云. 文旅融合创新驱动[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3-01-13(12).

③ 边继云. 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N]. 河北日报, 2023-02-23(07).

出发,对文旅融合之道做一个初步的探讨。

提出文旅融合的时代背景是什么?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高速增长,当前我们的国家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我们要在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寻找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根基。这是笔者对文旅融合的时代背景的认识。

笔者想从城乡关系的角度去讨论当下中国的社会型态。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中,数亿农民摆脱土地的羁绊,转而走入城镇,与工业、服务业结合,开启了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根据国家统计部门的数据,2022年中国城镇化水平达到65.22%,已远非费孝通先生笔下的乡土中国,未来中国城市化水平会继续提高,与西方发达国家不断接近。但是,如果将对城市化的观察从统计数字扩展到日常生活,就能发现中国城市化区别于西方的独特性。西方城市化虽然将人们带入一种现代的生活方式,却是以破坏乡村和村庄的社会基础为代价,它将原来的人地关系、组织形式、社会纽带、情感联结等一切摧毁,重新锻造出完全不同于乡村的社会关系、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心理,进而塑造出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形态——城市社会。和中国一样,西方城市化的起点是乡村,但是随着人口单向地转移到城市,随着整个社会经济中心转移到城市,乡村在城市化过程中极度萎缩,乡村演变成成为提供农产品和自然生态的乡野,作为社会型态的乡村甚至不复存在。西方城市化走的是一条城市崛起、乡村衰亡的道路,亦可概括为“拔根的城市化”。

与西方拔根的城市化相比,可以将当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称作“扎根城镇化”^①。由于工业下乡和公共服务的覆盖,中国社会重心迄今仍在县域,县域成为最基础性的载体。县域工业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第三产业创造出相当的工作机会,对人口具有有力的吸纳作用。县域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到全国的一半以上,在产业基础与公共服务的双重保障下,县域成为我国人口集聚的重要空间。根据笔者研究,迄今为止,我国县域常住人口仍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以上,而人口超百万城市的合计人口只占总人口的29.77%。能够发现,我国的人口分布并未呈现出以大城市为主的样貌,县域成为我国产业发展和人口集聚重地。

即便是在看似已经高度城市化的县城,深入观察,也能发现弥散在日常生活中的乡土性:原有的乡土文化纽带在一个更大的空间里被重新编织,并扩展为更大的社会关系网络。我们在湖南浏阳的

研究发现,即使那些在中心城区安家的乡村人口,在短距离和便利的交通下,也和老家、村庄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留住人的基础上,村庄内原有的社会纽带、群体状态、风俗活动、文化传统也得到了延续。村庄内社会联结仍然紧密,人与人并未疏离,能够维持一种相对整合的状态。即便在中西部地区,大量青壮年首选在城市安家,他们的日常生活已经远离村庄,但是岁时节庆、人情往来等仪式生活和社会交往,他们仍然选择在村庄进行,村庄仍然是他们走出来仍不忘并保持重要联系的根。

与西方的城市社会相对照,我们可以将扎根城镇化塑造的社会型态称作城乡社会。在这种城乡关系下,城市和乡村相互补充、相互支持,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条件,并因着彼此的沟通交流使得自身更加完善。

在笔者看来,城乡社会是中国推进文旅融合的最重要的社会基础,深入探究和准确理解城乡社会的特点,是我们努力接近文旅融合之道的起点。在当下中国的城乡社会中,乡村的生计空间不断萎缩,越来越多的乡村人口进入城镇,但乡村并没有消失,它不仅是1/3中国人的常住地,而且仍然是那些出走并常住城镇的人的家园和故乡。城乡社会的这一特点为文旅融合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一方面,乡村的存续让活态乡土文化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中国的城镇化是很晚近才发生的,目前仍在进行中,且不说那些与家乡保持着密切联系的新市民(农民工),即便是稳定定居城市的市民,离开乡土也不久远,在生活方式和习性上仍然与乡土有亲近性,有着浓浓的乡愁。对比西方,理解会更加深刻。在一元化的城市社会中,乡村社会型态不复存在,曾经的乡村文化只能以物质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式得以展现,为早已城市化的现代人提供一个凭吊逝去的往昔的机会。

文旅融合,文化是灵魂。在城乡社会中推进文旅融合,必须坚持以文化持有人为主体的原则。乡土文化是乡村人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发展出来的一套行为方式,体现出他们看重的价值和规范,嵌入乡村日常生活和岁时节令中。说到底,乡土文化首先是乡村人的文化。在乡村推进文旅融合,应学习钱穆先生倡导的对待本国历史的态度,对乡土文化抱有“温情与敬意”。如此,才可能对已经在市场经济和城镇化浪潮的冲击下不断凋零和碎片化的

^① 卢晖临,栗后发. 迈向扎根的城镇化——以浏阳为个案[J]. 开放时代, 2021(4): 158-177; 9.

乡土文化起到培力的积极作用。

然而,笔者也注意到当前乡村文旅开发中的一些有违文旅融合之道的不好的做法。以传统村落的旅游开发为例,各地都下了很大力气去挖掘民俗和仪式等文化元素,并将其发展为旅游观光项目。当嵌入村落社会系统中的民俗和仪式被生硬地剥离出来,成为仅仅满足外来游客观光(猎奇)需求的“表演”时,民俗和仪式也就不断丧失其内在精神,越来越与当地人的生活疏离。就此而言,旅游开发造成的后果往往是一个个徒具传统之形而无传统之实的传统村落。在这种文旅开发中,一遍遍展演的文化形式与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渐行渐远,既损害了当地的乡土文化,在消费体验上也难以持久。在笔者看来,这种文旅开发是完全浪费了中国作为城乡社会的有利条件,将本来活态(但面临凋零和破碎化风险)的乡土文化“非遗化”。

好的文旅融合,其出发点和最终目标是让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文化传统在新时代新条件下得到传承,并因应时代变化做出相应的革新,在传承与革新中让传统以活态的形式绵延。好的乡村文旅融合,让乡村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给乡村带去资源,拓展乡村生计空间,助力乡村发展。好的乡村文旅融合,让城市人亲近自己的文化根脉,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让城市空间不断增加温度和温情。回到本文的主题,好的文旅融合,让扎根城镇化的愿景成为现实,促进城乡社会更加美好完善。

“有道无术,术尚可求也;有术无道,止于术”。在正确认识和理解文旅融合的正道的基础上,不断试验不断探索文旅结合的新方法,一定可以让文化根深叶茂,让旅游产业具有真正的生命力和持久性。

(作者系该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收稿日期:2024-04-28)

农旅并进:乡村振兴新类型

徐新建^{1,2}

(1. 广西艺术学院,广西 南宁 530022; 2. 四川大学,四川 成都 610065)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4.06.003

一、以农为本还是唯旅为大?

农旅并进同时关涉农业问题和旅游问题,也可以说是农旅相加所派生的新挑战;而对二者并进的强调,则是社会演变的必需,亦是学术研究之拓展,在一定程度上还可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体现,

即在国家力量引导下,让旅游成为社会发展的助推器,带动农业及其他行业的振兴、转型。

不过,由此亦引出了一个亟须破解的双向难题。从“旅”观察,此难题指向乡土社会的旅游拓展及行业融入,可称为涉农之旅;由“农”审视,则关涉以乡村为本体、借旅游为助力的“三农”修复和重建,亦即国家倡导的乡村振兴,堪称涉旅之农。之所以称为难题,就在于农旅之间的不均衡与理论阐释的不相配。一方面,相较于势头强劲的旅游产业而言,“三农”——农业、农村、农民处于相对的弱方,每每扮演为旅游开发的被动承受者;另一方面,旅游学界的“涉农”研究明显滞后,学科兼容的知识储备不足,在闯入乡村之际缺乏对“三农”问题的真理解和真关怀。结合中国社会的发展实情,此难题未获化解的结果,是增大了农旅之间的相互脱节,扩大孙九霞课题组揭示的行业与人群鸿沟,致使“旅游资源开发与共同富裕目标仍存在较大差距”。说透一点,亦即对农业问题与旅游问题的认知脱节,欠缺结构上的整体观照。

作为一篇聚焦旅游的笔谈短文,本文用“三农”替换如今四处可见但意涵却日益模糊的泛指“乡村”,意在让“农”的根基重新凸显,使乡民主体真正在场。不然的话,有关农旅关联的阐发便可能聚焦含混,主位缺席,像近年不少单向度的艺术乡建项目一样,由于某些艺术家的一厢情愿,最终把乡村变成了“随意表现和肆意妄为的艺术试验场”^①。同理,当发动强劲十足的旅游业向农村“挺进”时,也需保持警惕,维护后者的农本根基,让彼此的关联成为双向互动,并进生长,而不是让乡村旅游的单边浪潮,因自我中心的开发取向,而将世代传承且至关重要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都逐一冲至边缘,乃至淹没殆尽。

于是,以农为本还是唯旅为大?是各显神通还是互补并举?便成为了发展涉农之旅时必须解决的核心难题。也正因存在如此严峻的考验,如何达成农旅并进的现实目标,无疑向旅游从业者尤其是以理论建构及批评为己任的旅游学界提出了新的呼吁,期待拓展论域,深入实地,获取新知;做到懂得农业、认识农村、理解农民,从而不仅使旅游在传统乡土的广阔天地获得延展,更让旅游成为新农业和新农村的组成部分。

^① 梁岩. 社会剧场: 艺术介入乡村行动的话语实践与美学机制[J]. 美术, 2024(1): 16-21.